

成功實踐 vs. 認知深化——新時代“一國兩制” 事業升級的基本要求

楊允中*

“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習近平：《中共十九大報告》

一、尊重歷史——理論研究不容淡化的原則

（一）“一國兩制”的歷史淵源與文化基因

1963年初，周恩來將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和主張概括為“一綱四目”：“一綱”即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四目”為：①台灣統一於中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委於蔣介石；②台灣所有的軍隊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③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蔣的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④雙方互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¹

歷史表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求同存異、對立統一，相信群眾、相信大多數，是中共一以貫之、堅持不懈的指導原則與思想作風，是它所領導的革命與建設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針對中國特殊國情，在實現國家最終完全統一征途上歷史遺留的台灣、香港、澳門問題尚待突破，上述“一綱四目”強調“一個中國”原則的不可動搖性，這是推動兩岸和平統一包括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的出發點、落腳點；同時強調保留原有社會經濟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除外交外台灣軍政大權、人事安排一律由蔣掌控，軍隊可以保留，台灣財政不足悉由中央政府支援，雙方互諒互尊，不傷民族感情。這是多麼清晰完整的創新設計，故稱之為“一國兩制”方針的早期版本，稱之為“一國兩制”思想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基因，絕對實事求是、公正合理。

中國國情特殊，革命與建設的經驗豐富，方向的明確性與策略的靈活性保持着很高的調整彈性。以下簡述幾項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

➤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統一戰綫被總結為中國革命成功三大法寶之一，它是同武裝鬥爭具同樣重要性的第二戰場。

➤ 1949年歷經28年艱苦卓絕鬥爭，中國共產黨奪取了全國政權。而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組建最高國家公權力機關、行使國家全面管治權的，正是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能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全國委員會。這也意味着中國人民政協制度存續史早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全面體現統一戰

* 澳門理工學院名譽顧問、教授

綫思想的人民政協制度直接被定位成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並列的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是一項集執政黨與參政黨兩個積極性，既政治協商、參政議政又民主監督的基本政治制度。歷史已經證明，這是一項旨在實現凝心聚力、團結最大化的戰略設計和指導方針。

➤ 1953年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舉世公認推動兩大基本社會制度對立統一的國際關係指導原則。

➤ 1955年中，毛澤東、周恩來針對國內、國際形勢新特點明確提出：台灣可以考慮用非武力手段解決。

➤ 1955年周恩來在首屆亞非國家萬隆會議上面對美蔣及國際反華勢力阻撓破壞，力挽狂瀾、力排眾議開創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先河。

➤ 50年代中毛澤東提出台灣問題可以從長計議，可以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1959年講“只要台灣斷絕與美國的關係，與大陸和平統一，大陸方面對台灣也將採取靈活措施，一切都可以照舊，台灣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大陸實行社會主義。”以後又講“我們容許台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台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

➤ 1963年周恩來針對台海形勢總結歸納的“一綱四目”方針已具相當完整的“一國兩制”理論框架。

➤ 1972年中國成功接待美國尼克松總統，實現不同社會制度最大發達國家與最大發展中國家之間跨太平洋對話。

➤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號召結束兩岸軍事對峙，實行通郵、通商、通航“三通”，促進和平統一。

➤ 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委員長發表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包括台灣成立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以及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對外關係不變。特別行政區一詞首次公開提出。

➤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發表，強調關於主權問題中國沒有迴旋餘地，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香港仍將實行資本主義，現行許多適合的制度要保持。這表明香港有望成為中國第一個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

➤ 1982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通過現行憲法，其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設立可以實行同國家主體部分不同制度的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為國家憲制規範，這是國際憲政史上空前的創新突破。

➤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明確提出兩岸和平統一設想：“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²

➤ 1992年海峽兩岸半官方代表即大陸的兩岸關係協會和台灣的海峽關係基金會達成關於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成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一條底綫。

➤ 1995年1月30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發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江八點”主張，號召兩岸在堅持一個中國前提下全面發展互惠互補關係。

➤ 2005年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的連戰應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之邀到訪北京，雙方確認“九

二共識”，號召兩岸早日實現“三通”。

➤ 2017年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14項建國方略之一。

人們不難看出，實行改革開放新政後鄧小平直至習近平關於兩岸和平統一構想，同國家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的原則性主張具有高度一致性和歷史繼承性，其中1981年的葉九條、1983年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全面構想、2017年習近平的建國方略第十二項，同周恩來1963年初的“一綱四目”既淵遠流長、一脈相承，又當仁不讓、與時俱進，從而成為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基本國策進入高可行性成熟化的發展新階段。

(二) 港澳有幸成為“一國兩制”驗證基地

香港、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固有領土，鴉片戰爭後分別被英葡實行殖民管治，恢復對兩地行使主權是世代代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央人民政府對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澳門問題”高度重視、十分慎重，既要維護國家主權，堅定予以解決，又要在最後解決前採取特殊靈活政策。

➤ 20世紀50年代中央審時度勢制定的港澳工作方針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所謂長期，至少要以十年為計算單位，所謂充分，係指要認準港澳特殊地位，發揮其不可取代的獨特作用。其實，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便指出，對港澳事務“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社會主義化”。

➤ 80年代初鄧小平明確指出20世紀末要實現國家和平統一三大任務：兩岸統一、香港回歸、澳門回歸，由於80年代後期台灣高層人事更替，兩岸和統進程受阻，港澳回歸便刻不容緩，且要走出一條新路。

➤ 1984年、1987年中英、中葡之間分別達成認同中國政府對港澳恢復行使主權的聯合聲明。中國政府體現“一國兩制”基本內涵的12條方針政策分別載入《中英聯合聲明》正文第3條和《中葡聯合聲明》正文第2條，國家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後成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已成一項堅定的基本國策。

➤ 1990年、1993年《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成功制定，從而令“一國兩制”方針進入具體化、法制化、規範化新階段。

➤ 1997年、1999年“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正式在國家恢復行使主權後成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實施，開創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壘對決、對接對話的人類文明史上創舉。

➤ 1999-2019年澳門成為舉世公認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範例，不僅政治民主有序發展，而且經濟突飛猛進，成為全球最高發展指標之一。2018年GDP為澳門幣4,402億元(約545億美元)，人均GDP澳門幣666,893元(約82,609美元)，實際增幅為4.7%³，高過全球平均值近2%，高過發達國家平均值一倍以上。澳門的跨越式發展顯然是國家日益強大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巨變的最具說服力以及“一國兩制”科學性和生命力的驗證實體。

澳門實現歷史性回歸、成立特別行政區以來沒有延誤特定歷史發展機遇。如今廣為國內外所熟悉的“一國兩制”方針也就是半個多世紀前基於特殊國情推出的“一綱四目”原則以及建國初期明確強調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針在改革開放新形勢下的合理延伸與具體化，這是既利國又利民，既利當代又利長遠的對立統一思維的成功演進與創造性發揮，當然也是中華文明五千年演進完善進程

中的人類大同與辯證思維的當代展示，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東方世界的成功創新。

(三) “一國兩制”理論淵源

“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門回歸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⁴

由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大版塊組成的馬克思主義，開創了同原有資本主義相對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推動了代表工人階級與勞動大眾利益與要求的新型政黨的出現。170年來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的對立鬥爭此起彼伏，風風雨雨，成為當代人類文明史的演進主軸，其中幾個里程碑式標桿不能不提及。

➤ 馬克思、恩格斯 1848 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標誌着代表全球發達板塊的歐洲文明轉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基本社會制度全面對抗開啟。

➤ 列寧 1915 年預測“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⁵，他領導 1917 年十月革命開創的蘇維埃制度成為首樁社會主義制度實踐模式，但由於長期保守變質 20 世紀 90 年代初已自行瓦解。

➤ 毛澤東從中國國情出發主張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他於 20 世紀 30 年代發表的《矛盾論》、《實踐論》代表馬克思主義哲學東方化。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同古老中華文明相結合必然會改寫東方史和世界史：1949 年擁有人類 1/5 人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78-2018 年改革開放令中國站到世界舞台中央。

➤ 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選擇。”⁶ 他的“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內涵和兩大基本社會制度對壘對決的智慧選擇，也是當代東方馬克思主義在佔人類 1/5 生存空間建樹的嶄新理論標桿。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行動指南。”⁷ 這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進行艱辛理論探索取得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⁸

二、思想解放大潮中的理論創新

2018 年 12 月是中國改革開放新政實施的 40 週年。這 40 年在幾代中國人記憶中留下的是真正的改天換日，真正的告別貧困與落後，真正的揚眉吐氣。本人在 2018 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有過下述評語：根據對現存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深度思考與感性體驗，人們似乎可以推導出這樣的認知：如果說 19、20 世紀是現代資本主義代表的西方文明主宰世界，那麼 21 世紀各國人民將見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代表的東方文明在全球範圍內的導航與保障；如果說全球最大的中華民族

巨輪有望在 21 世紀中葉駛達民族偉大復興的勝利彼岸，那麼全新設計的澳門號“一國兩制”新船將會是編隊同期抵埗當之無愧的一員。⁹ 基於歷史與現實、國情特點與制度保障，“一國兩制”的橫空出現與成功驗證表明，人們對現存東西方兩大文明體系的理解、認知、踐行已達到一個空前未有高度，“一國兩制”文明已達到日趨成熟化的境地。

繼續保持高品位、高質量發展，並強化對自身發展規則認知和行動自覺，這是堅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實現“兩個一百年”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使命與時代要求，當然也是當代澳門人以實際行動“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¹⁰的最大幸福感、獲得感、成功感的滿足過程。

（一）認知領域神秘論應該也可以破除

“我們講了一輩子馬克思主義，其實馬克思主義並不玄奧。馬克思主義是很樸實的東西，很樸實的道理。”¹¹ 中國改革開放 40 年間，不僅國家大政方針從指導思想到具體舉措相繼發生了體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巨變，而且廣大群眾從認知到心理同樣經歷了一場新事新辦、特事特辦的深刻洗禮。其實，所謂改革，就是告別一切不利國計民生、不合時宜舊規舊俗；所謂開放，就是打開國門，把外界一切好的進步的文明成果吸收過來。

作為社會群體的一員，每個人都不可能脫離周邊世界，都不可能不受時代與環境的引導與約束，每個人都要在綜錯複雜的社會關係和性質不同的矛盾中生存與抗衡、博弈與前行。歷史表明，無論自然界還是社會領域都存在可認知性、可探索性，適度掌握一些認識論、方法論的知識與技巧，就意味着擁有更多行動主導權和成功因素。這既是哲學範疇一項基礎性核心課題，也是人們認識社會、認識自己所不可或缺的行為規範。哲學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與前導，但絕不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測的禁區，它的可探索性、可認知性，它的規範、樸實一面可以令人更多更全面地瞭解發展規律以至避免浪費資源、妄走彎路，從而令普通人也可生活更精彩豐富、更有尊嚴和自信。故此，有必要嘗試並力求用現代歷史觀、文明觀、創新觀來回應歷史大變革，回應歷史大變革引發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領域的新矛盾、新問題，新挑戰、新機遇。

（二）幾項尋常可接觸的認知

對於“一國兩制”這樣體現理論與制度全面創新的事物，應強調多元多角、多域多維的精準觀察、思考、探索、判斷。以下僅舉一反三列出幾項常用切入方法。

一是知行合一觀。知行統一、知行兼程、知行共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理論靠實踐驗證也靠實踐補充完善，兩者不容脫節。

二是求同存異觀。大同小異、同中有異、化異為同、互利互贏，同與異本身就具相對性，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同，也沒有絕對的異，同異共生共存、互補互鑑是求真求實的客觀要求。

三是開放開明觀。既要打開國門，把一切人類文明成果吸收進來，為我所用；也要開誠佈公、透明寬鬆、包容和諧，做開明開朗的人，這是社會發展進步要求，也是修身齊家、健康成長的行為準則。

四是對立統一觀。是非、真偽、強弱、敵我等概念無不具有動態性、相對性、可轉化性。要掌握事物發展主動權，就要設法認識矛盾轉化規律，就要學會並善用辯證法，要力爭轉弱為強，化被動為主動，化敵為友，令劣勢此消彼長、優勢此長彼消，積極尋求願望與利益的最大公約數。這是哲學普

及化大眾化必由之路，也是事業成功的可靠保障。

(三) “一國兩制”理論核心要素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澳人治澳”、高度自治、50年不變，這在基本法總則、中央與特區關係、居民基本權利與義務、政治體制等關鍵性章節中已有十分明確精準的規定，十九大報告“兩個最佳”也已作了進一步概括，實踐亦有針對性地表明，上述核心要素還要輔之以愛國愛澳、自強不息、開拓進取、為國拼搏等時代精神和歷史傳統。總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不是孤立地自行闖蕩，而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棋盤中縱橫捭闔；不是脫離國家、民族發展大局自行其是，而是與全國全民大家族一道為民族偉大復興而盡心竭力、互補共贏。更進一步講，“一國兩制”理論就是要突破傳統政治經濟學對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立、鬥爭絕對化的認知，而把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強調的實事求是原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科學化、創造性運用落到實處。這是現代版、中國版馬克思主義，這是東方文明的成功升華。

“一國兩制”研究對象與範圍越來越清晰明確，表面上直接涉及國家主權論、兩制共存論、當家做主論、高度自治論、長期不變論、持久示範論等基本判斷。這些原則看來似乎不難理解與接受，十分樸實實際。所以形成了基本國策，不僅因為它充分體現了國家賴以存在與發展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而且也因為它事實上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廣泛領域的理論突破與創新，其深刻性、廣泛性均史無前例。以“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原則為例，無論從宏觀到微觀、從歷史到現實、從橫向到縱向，均可構成一部完整的教科書。由殖民管治性質的葡人治澳過渡到本地“澳人治澳”，而且縱向維度上中央政府不派員治澳，橫向維度上也不調派其他地區人來治澳，這對回歸時只有22平方公里面積和42萬居民的彈丸之地實在意義非凡。正如前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所講：“實踐證明，澳門人是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澳門的。”¹²

憲法規定，中國是單一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是其不容挑戰的執政黨。在中央政府領導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其“澳人治澳”政權形式卻是除香港外惟一不正式建立同級中共組織架構的公權力機關，儘管特區上下自始至終都要尊重中共執政黨地位、尊重中共領導下的中央政府、尊重憲法和憲法確定的國體政體，即尊重中央全面管治權不存選擇性。當然，從港澳兩地正式回歸之日，即實行“一國兩制”特別行政區正式開局之日起，中央政府駐港澳特區聯絡辦公室、外交部駐港澳特區特派員公署、解放軍駐港駐澳部隊或正本求源或全面進駐，這也是落實憲法、基本法規定，體現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特別設計與安排。而中央人民政府即國務院下設港澳事務辦公室、全國人大常委會下設港澳基本法委員會，更凸顯兩個特別行政區的特殊法律定位，也開創了國家公權力機關改革開放、與時俱進的先例。所以，認識“一國兩制”不僅要從特區本身切入，同時也要從國家層面加以認定。可見，這場制度創新着實不存先例，之前也不曾有人探討過。實質上“一國兩制”早已突破傳統學科的分野，成為一個完全可以自行發展的綜合性新學科，或稱之為多元跨越的複合型學科：這就是“一國兩制”學或多贏學(Polywinology)，核心當然是“一國兩制”憲法學以及“一國兩制”政治學，“一國兩制”哲學等，宏觀上即包括法學、政治學，又覆蓋國防學、外交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以至哲學、心理學、美學等領域。

(四) 國家基本政治制度

“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澳門基本法》第 5 條）這表明①澳門特區實行的是與國家主體部分不一樣的制度和政策，②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可以保持，③實踐期預設 50 年不變。這就是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的三大核心要求，這就是特別行政區制度，具體地說，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故此，把特別行政區制度同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等同的認識是不確切不全面的。

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份屬憲制、憲政領域的核心課題，中國憲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制，中國憲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政，中國現有四大基本政治制度，其中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根本制度，中共領導下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基本制度。這些政治制度係基於中國獨特國情與特定發展階段，總結以民為本、依法治國豐富經驗而形成，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最核心的內涵與發展要求。

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實踐業已有兩個十年期的驗證。特別行政區制度，事實上作為一項前所未有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成果，有利於當地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更直接促進國家和平統一大業；“一國兩制”姓“中”，特別行政區制度也姓“中”，受到舉國上下認同、支持，也受到舉世公認。事實上，它業已成為暫時不叫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所以，適當時機被定位成國家級新型基本政治制度，將是眾望所歸、民心所向、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取捨。

這個特別行政區制度，即“一國兩制”政治制度是百分百的國產國貨，是中華文明五千年演變的必然，是當代獨特中國國情的獨特要求，它滿足的不僅是現有港澳兩個特區廣大居民的福祉和利益，而且也是近 14 億全體中國人民以及海外華人世界的共同期盼和要求，甚至可能引發中國改革開放代表的當代思想大解放的深化與拓展。

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政權屬性至少可以列出：①管治形式的垂直從屬性，或中央管治權威不可越逾性；②高度自治權的中央授予性；③兩大基本社會制度求同存異、對立統一的深度探索性；④理論與制度雙重創新性；⑤國家既定目標與居民實際福祉高度一致性；⑥示範效應全方位性、多元多域性。

(五) 現代國家觀

在推進“一國兩制”事業中，伴隨浩浩蕩蕩的愛國愛港、愛國愛澳主體價值觀認同，樹慾靜而風不止，一小股“獨”風時有展露，有人認為事屬正常，高國際化高多元化必然伴生一些基於認知和利益糾葛出現的對抗，有人認為匪夷所思，和諧穩定的形勢以及普羅大眾切身利益勢必受到衝擊。一個新生政權建立 20 年後管治基礎仍欠穩固，這絕非正常現象，但這有助於增強社會免疫力，也符合辯證思維。認真作好對外部因素的防範固然重要，但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的道理十分清楚。在推進對長達 20 年“一國兩制”實踐規律進行回顧、總結中，應該看到由於“怕”字當頭，怕東怕西，就是不怕國家核心利益與特區整體利益受傷害，為甚麼平民百姓往往都能確認的一些事項某些身居高位的人反而認知不足，所以普法教育的目標群體顯然需要實現居民全覆蓋包括高端人士。

所謂現代國家觀亦即正確的國家意識，它至少應涵蓋下述領域基本要求：①對憲法及其確認的國體政體包括中共領導地位的認同；②對中央全面管治權的認同；③對國家領土主權、核心利益的認同；④對國旗、國徽、國歌等國家標識的認同；⑤對國家傳統文化及國家通用語言的認同；⑥對二元性中

國國情的理解與認同。

(六) “一國兩制”文明觀

在國家全面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核心價值觀的新時空，在特別行政區強調“一國兩制”文明觀是理所當然、與時俱進的必要舉措。所謂“一國兩制”文明觀，至少應涵蓋以下基本認知：

①愛國觀：堅持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是當代任何國度的居民都不應該喪失的心理素質，愛國愛澳、愛群愛己，已成特區居民一項時尚價值符號；

②是非觀：尊重客觀、尊重事實，大是大非面前有主見，真假、善惡、美醜面前不失據；

③奮鬥觀：敢為人先、敢闖新路，肯付出、懂競爭，善開拓、巧發力，改寫平凡、成功在己；

④生存觀：珍惜生命，珍惜時間，積極樂觀，目光朝前，不越權不違規，生理與心理雙健康；

⑤榮辱觀：保持個人榮辱與國家榮辱一致性，與權錢導向行為絕緣，站穩做人做事起碼台階。

(七) “國家所需、澳門所長”

作為特別行政區被國家作出特殊法律定位加以保障，作為特區居民無時無刻不享有國家相關政策的關懷和支持。故此，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同國家保持同向同步前進步伐，就是一項義不容辭的時代使命。

1. 國家對澳門的“需”

應該強調的不是泛泛的國家所需，而是有特殊針對性的“需”：一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做“一國兩制”排頭兵；二需澳門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既主動搭乘中國發展快車又敢於拓展新型發展模式；三需澳門成為國際文明指標的載體，澳門近20年跨越式發展屢創世界高指標，但澳門總體文明程度仍有頗大提升空間。

2. 澳門所能提供之“長”

澳門優勢很多，機會不少，當下要抓住的重點是：一長500年中外文化交流的獨特積累，澳門客觀上是東西兩大文明體系對接對壘的前哨，居功至偉；二長堅定悠久的愛國愛澳文化傳統，澳門是嶺南文化主要開拓者傳播者之一，開風氣之先歷久彌新，其中，鄭觀應、孫中山更是可以用國際級思想家予以歷史定位；三長多元而獨特的發展環境及多域創新的孵化器。在基本法保障下澳門擁有世界一流博彩業，政權性質上開拓、引領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的對壘對接。

3.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放包容、走自己路

踏入新時代新征程有必要形成社會共識的幾項是：總結20年“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基本規律：拿出澳門經驗、澳門選擇、澳門做法、澳門取向；關於社會基本矛盾，澳門仍然是財產佔有為背景二元結構二極分化社會結構，要改變現狀離不開政府與社會兩強驅動、產業與社會結構兩個深度調整；提升國家意識、尊重中央權威，發展積極健康的中央與特區關係，既是20年來成功經驗之一，又是有待全澳上下長期關注、長期維護的課題之一。

(八)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衡量指標具體化

“‘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中共十九大作出的上述認定完全符合港澳兩個特區

的現實。當然，由於觀點、視角不同，即使生活在特區內部的人士在涉及這項落實基本國策大方向、大原則上的判斷存在一定差異，也是正常的。承認並認定成功實踐恐怕還要作些基於特區現實的具體分析，講明確一點，把八條衡量指標與發展要求拓展一下也許具有一定合理性：

其一，**國家恢復行使主權、全面管治權落實到位**。憲法、憲制、憲政受到高水準尊崇與實施。這是一項涉及國家領土主權完整、洗刷多年民族恥辱的原則性大是大非，中央全面管治權到位不僅意味着中央管治權威得到應有尊重，而且也要求在新興政權下不允許有意欲挑戰憲法憲制憲政權威即挑戰國體政體現象存在。

其二，**特區新興政權行使高度自治權有效不越位、民本不官僚**。享有行政高度自治權的特區公權力機關的民本性、愛國性、法治性、開創性，一時一刻也不容淡化。

其三，**社會和諧包容穩定等文明指標常態化、有感化**。“一國兩制”新制度、新政權其最大優越性是求同存異、有容乃大、化異為同、互利共贏，包括實現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對立統一。

其四，**經濟持續走強，民生持續走高**。經濟是基礎，民生是驗證社會制度優越性的高靈敏度指標。

其五，**治港港人、治澳澳人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形成主流**。作為文明發達社會制度建設創新標誌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不僅有能力有辦法而且也有智慧。

其六，**特區正面積極形象被國人、世人普遍接受認可**。作為全新先進發展理念的體現，“一國兩制”的創新性、科學性、可行性，不僅要得到全國人民的理解與認同，而且還要在國際範圍內廣受讚揚與嫉羨。

其七，**新時代新征程上，新思維新作為成為自覺追求與常態要求**。進入全新歷史發展階段，爭取更高水平“一國兩制”實踐成效，關鍵在於特區政府和廣大居民通過建立相關新思維新作為令創新常態化。

其八，**年輕一代接班人培育受到重視並具可比性成效**。確保“一國兩制”事業薪火相傳、後繼有人，全力培育並大膽啟用年輕一代優秀人才，是一項時代課題，同時也不容放鬆非年輕人綜合素質的持續提升。¹³

三、認知深化與系統研究

(一) 進一步作好“一國兩制”理論定位

新時代新征程上認知不容缺失。“一國兩制”屬人類文明史上罕見的科學化認知的積累、驗證、碰撞、吸納、兼融成果，說它是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理論中的寶中之寶、重中之重，絕不過分。進入新時代新征程，人們的理性認知的深化系統化和感性踐行的自覺化高標化都應倡導。

“一國兩制”出現並實踐在當代中國有其歷史必然性，說它是中國獨特國情的產物毫不誇張，因為中國是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東方大國，也是國情十分複雜的發展中大國，它是大國、大民族、大歷史的認知創新和實踐結晶，具有高代表性、高公信力、高成熟性。

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長逾 20 年成功實踐表明，“一國兩制”是全新理論體系，其出現既有遠因也有近因，無論用中國傳統文化還是用馬克思主義加以認定，它都份屬基礎學科中的新興學科，基礎

理論中的創新理論。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內涵之一，實現“兩個一百年”中國夢中一項殊途同歸戰略安排，也是東方文明認知體系的拓展、集結、嫁接、優化。

(二) 正確理解仍有頗大提升空間

進入新時代新征程，毫無疑問，“一國兩制”事業要有新視角新要求。需要防範的一種現象恐怕就是簡單化、表面化、絕對化思維，它誤人誤事、誤國誤民，也是特殊國情、特殊區情、特殊發展階段值得高度重視、普遍重視的社會課題。

探索、發掘、研究“一國兩制”要從宏觀與微觀兩個維度切入。宏觀上，這絕不僅僅是專家、學者少數人的事，而是政府與社會普遍應加大力度關注、加大力度跟進的一樁大事，沒有人夠膽說他能包辦、決斷這項宏偉事業，也沒有人敢說他與此不構成直接關聯。微觀上，不僅政府高層官員和專家學者，就是普通市民也有條件和必要性在提升公民意識基礎上多看看多想想，把特區“一國兩制”大課堂加以充分利用和展示，把強化愛國愛澳這項核心價值觀落到實處。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這是時時刻刻不容忽視的一項發展要求。空談當然不應提倡與默認，但對待原則性事項和理論的及時、理性、務實、精準理解絕不是空談，絕不應被納入限制、歧視之列。而實幹必須認準方向，堅守目標、充滿自信，保持清晰的方向感、合理的節奏感和付出的滿足感。

其實，在每個人面前有待認真而深入思考思辯的課題很多，諸如時間與空間、理論與實踐、憲法與基本法、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現代資本主義與本地原有資本主義、香港原有資本主義與澳門原有資本主義、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國家核心利益與本地整體利益、公民與居民、中文與葡文、開放與保守、自主與依賴等等，在回歸已近 20 年的時空，如果在核心層面、核心課題上存在認知低位或缺位，顯然不可默認其合理性。

近年由於憲法與基本法宣傳力度的加大，學術界和廣大居民對維護中央管治權威、提升國家觀民族觀收到實效十分明顯。其中，“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憲制基礎”更受到幾乎一致認同，這有很高合理性。因為憲法是國家(含特別行政區)最高法，基本法是特區最高法，由兩部大法設計、指引的特別行政區，其成立與運作具有合憲性合法性。對此予以充分肯定完全必要。當然，這項重要判斷似乎也存在邏輯嚴謹化的完善空間。“共同構成”顯然把憲法和基本法擺在同等地位、平起平坐，但憲法和基本法是母法與子法關係即上位法與下位法關係。事實上，表述為“憲法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基本法構成特別行政區憲制規範體系的規範化具體化”，則兩者關係會更為精準。

在直接關係特區發展的重大環節如參與“一帶一路”、推動大灣區戰略、85 平方公里海域開發利用、中美貿易戰、科技創新、青少年加速成長等諸多領域都是挑戰與機遇並存，都是涉及“一國兩制”下優勢合理有效開發的現實問題。一旦認知不到位，或停留在簡單化表面化絕對化層面，其消極一面必然會腐蝕寶貴的發展機遇。認知缺位事關“一國兩制”正確實踐大局，特別是政治事務領域性質更非同小可，絕不宜簡單化、表面化或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三) 思考、探索、求證、研究

必須堅持的幾個基本判斷是：①現代社會是高發達高文明社會，認知缺位必然導致行動的盲動無助；②無論離開發達的自然科學還是離開發達的哲學社會科學，均難談發達的現代社會，社會主義現

代化也好，“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也好，勢成空話；③依法管治、科學管治首先要求各級官員以及社會有影響人士學理論懂理論用理論，作清醒領路人；④重視學術活動更強調學者、研究人員不能自命不凡、孤芳自賞，也不能消極等待、隨波逐流。

不錯，澳門的某些發展指標不容小視，其社會和諧度、穩定度，寬鬆性、包容性，其核心價值觀調整，整體觀察應不低於香港。這是 20 年來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不誤戰機、共同開拓、自強不息、積微成著的結果，但本着居安思危、防範未然一類認知，把視角調正一點，也不難發現時下澳門仍有不少領域存在短板，不少課題值得政府與社會共同關注與破解。

四、結語

倡導“一國兩制”澳門版實踐模式已被歷史證明是必要而迫切的：作為理論，要倡導信仰與認知深化，即文化自覺；作為制度，要堅持實踐落實，發言權在自己手上，主動權由自己控制。第一個 20 年“一國兩制”事業可以也應該認定“實踐成功”，但這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欲求新時代“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行穩致遠，不容有基本認知的偏離或缺位。

一是“一國兩制”淵遠流長，應該堅持清晰明確的歷史觀，60 年代初已有基本成熟框架，而不應該割斷歷史。特區上下應該進一步強調現代國家觀，包括堅守民族文化傳統與當代國情觀，而不應有意無意被誤判誤導，遺害天時地利人和。

二是求同存異、對立統一體現的認識論方法論，應該宣傳、普及並擴大其應用面。故不應遠離哲學，包括矛盾普遍性、抓主要矛盾重要性，主與次可轉化性要成常態認知。

三是憲法、基本法教育，其定位需進一步提升。作為新興複合性學科，“一國兩制”或“一國兩制”憲法學應該全面進課堂，而不應一而再因理解不到位而貽誤戰機。不僅發育階段青少年要學要用，公職人員和一切有條件人士都應常態化關注、常抓不懈。

四是長逾 20 年實踐表明，特別行政區制度或“一國兩制”政治制度應該被認定國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相關研究的深化和基本認知的強調均應提升到新時代新高度。

五是明確三大定位與堅持三個有機結合。前者所指的是“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打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¹⁴ 後者所指的是“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有機結合起來，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把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尊崇法治，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把國家所需和港澳所長有機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市場化機制的的作用，促進粵港澳優勢互補，實現共同發展。”¹⁵

六是特區內部應該宣傳、普及“一國兩制”文明觀，令澳門在國際上更具競爭力和高形象。這是一項潛移默化、功在長遠的正能量轉化工程。

總之，新形勢下“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與基本認知的深化包括對其深入系統研究構成正相關，這是新時代“一國兩制”事業升級的一項基本要求。對回歸缺位現象的補課至少應開展專題研究，以期推動依法施政的深化和長治久安的持續到位。

註釋：

- ¹ 見《“一國兩制”百科大辭典》，澳門：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2011年，第396頁。
- ² 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頁。
- ³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本地生產總值2018》，第42頁。
- ⁴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報告》，載於《中共十九大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頁。
- ⁵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精粹本)，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第876頁。
- ⁶ 《習近平總書記系列主要講話讀本》，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頁。
- ⁷ 同註4，第16頁。
- ⁸ 同上註，第15頁。
- ⁹ 楊允中：《“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合格載體誰屬》，載於《“一國兩制”研究》，2018年第4期(總第38期)，第19頁。
- ¹⁰ 同註4，第45頁。
- ¹¹ 同註2，第382頁。
- ¹² 胡錦濤：《在慶祝澳門回歸五週年及第二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載於《澳門日報》，2004年12月21日，第A1版。
- ¹³ 楊允中：《正確判斷澳門區情：一個永恆的主題》，載於《“一國兩制”研究》，2019年第1期(總第39期)，第48、49頁。
- ¹⁴ 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載於《澳門日報》，2019年2月19日，第B10版。
- ¹⁵ 同上註。